

重磅
品荐

在时代浪涛与青衫间觉醒

王小柔



《范仲淹》(全三册),何辉著,重庆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课本走向泰州海岸的雨雪之中,那个曾经只在历史书页里以“贤臣”“文豪”标签存在的范仲淹,忽然在何辉的笔下有了温热的呼吸与跳动的脉搏。翻开《范仲淹》,青黑色的海浪正卷着白沫拍打未竟的堤岸,一位身着青色官服的县令正按着望楼的木栏杆蹙眉远眺。他的脸被海风烈日灼成古铜色,剑眉下的眼眸藏着倔强,唇边短须凝着雨雪的痕迹。这不再是史书里“建议筑捍海堰”的冰冷记载,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命运的浪涛前:他会在民夫遇险时纵马冲入风暴,会在尸横海滩时用俸禄购置置地,会在百姓阻挠复工时红着眼眶疾呼:“难道愿意做无地无根的孤魂野鬼。”当“朱说”归宗复姓为“范”的往事被海风轻风吹散,当“希文”之字里藏着先贤之志在堤岸泥泞中生根,那个我们背诵过无数次的名字,终于从泛黄的史卷中走出,带着盐粒的咸湿、雨雪的冰凉与民心的滚烫,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痛有勇的立体生命。

这部以范仲淹1024年任兴化县令至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为叙事主线的三卷本巨著,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传记,也非架空演绎的通俗小说,而是以“史料为骨、文学为血”的新史家创作实践。

历史现场的文学重构

何辉的叙事艺术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现场的精准还原与文学再造。小说开篇即聚焦天圣三年泰州捍海堰工程,这段在《宋史》中仅寥寥数笔的记载,在作者笔下延展为一场充满张力的生存斗争。青黑色的海面“如一大锅煮沸的水”,临时垒起的堤基在海浪冲击下“像一条灰黑色的细线”,环境描写的隐喻性与写实性在此完美融合——既写出了自然力量的狂暴,更暗示了民生工程的艰难。

范仲淹在灾难中的决策过程堪称展现其“实践理性”的经典切片。当海浪越过堤基涌入内侧时,他先是下令“将应急用的沙包、石块全部垒上堤基”,在险情加剧后又果断传令“让沿岸筑堤民夫赶紧撤”。这一“筑”一“撤”的转变,没有豪言壮语的渲染,却通过“心在胸膛中剧烈跳动”“使劲咬着牙关”等细节,刻画出一位官员在民生命运与工程成败间的艰难抉择。更动人的是灾难后的场景:两百余具民夫尸体横陈海滩,范仲淹“拿出自己的俸禄买了一片坟地”安葬无名死者,这种超越官僚职责的人文关怀,让“先忧后乐”的精神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作者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功夫在工程重启的冲突中凸显。百姓以“触犯龙王爷”为由阻止复工时,范仲淹的驳斥并非空泛说教,而是基于对地方历史的深刻认知:“我泰州海陵、兴化县之地,自唐代以来,本来土肥地沃……那是因为有前代留下的捍海堤啊!”这番话既符合范仲淹“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又巧妙植入了唐代捍海堰的历史背景。而他对堤基的技术改良——“往里移一百步,同时加宽堤基、增加堤高,增设涵洞”——更是将史料记载的工程措施转化为可感的治理智慧,让读者看到理想主义者如何用务实手段实现抱负。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贯穿全书。从兴化县令到陕西副押,从秘阁校理到参知政事,范仲淹每一次职务变动都伴随着具体的治理实践。在陕西边疆,他“重用张亢、狄青等名将”,并非简单的人事安排,而是通过军需调配、战术演练等细节,展现其“修武备、固边防”的军事思想;庆历新政期间,他推进的“明黜陟、抑侥幸”等改革,在小说中转化为与富弼、欧阳修讨论条文的具体场景,让枯燥的政策条文有了人的温度。正如韩琦在《文正公奏议集序》中所言,范仲淹“由小官擢

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小官”时期的实践积累,为其后来的“危言鲠论”铺垫了坚实的人格基础。

士大夫群像的立体塑造

历史小说的深度,往往取决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何辉在塑造范仲淹这一核心人物的同时,更以群像笔法勾勒出北宋仁宗朝士大夫的精神图谱。晏殊的荐贤、韩琦的协力、富弼的追随、欧阳修的辩护,甚至吕夷简的排挤、夏竦的陷害,都不是简单的正反派划分,而是构成了一幅“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朝堂生态图。

滕宗谅与范仲淹的友谊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精神纽带。作者特别强调两人“同榜进士”的身份渊源,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暗示了北宋科举制度对士大夫群体形成的塑造作用。后来滕宗谅因“涇州挪用公款案”遭弹劾时,范仲淹力辩其“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这种不因祸福而变的友谊,正是欧阳修所言“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的生动诠释。

朝堂上的权力博弈被作者处理得极具历史质感。王曾与吕夷简的角力并非脸谱化的正邪之争,而是不同政治理念的碰撞。王曾看到弹劾范仲淹的奏章时,首先质疑“伤亡两千余人”的数字真实性,这种对事实的坚守与他“连中三元”的学者底色相符;而吕夷简的“包藏野心”,则通过他对范仲淹“以渎职罪问斩弃市”的暗中推动来展现,反映了北宋“党争”的复杂性。作者没有简单否定吕夷简,而是通过其“请免农具税”“谏言罢黜运河木石”等早年政绩,说明即便是政治对手,也有其“为国爱民之心”的一面,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让人物更显真实。

更难得的是,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刻画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局限。对范仲淹的母亲虽着墨不多,但其“带着两岁的他改嫁给朱文翰”的选择,既解释了范仲淹早年“朱说”的身份由来,也暗示了宋代女性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太后刘娥对范仲淹的态度——从“因上书为寇准辩诬而不悦”到令其“啃难啃的骨头”,展现了这位垂帘听政者的政治手腕,也让北宋“后妃政治”的特殊性得以呈现。这些角色虽非主角,却共同构成了士大夫生存的社会网络,让历史场景更加完整。

奏札诗文里的历史真实

何辉在史料运用上展现出独特的创作智慧。小说并非简单地将史料转化为故事,而是让奏札、诗文、碑铭等原始文献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以史证文,以文释史”的艺术效果。奏札的插入是最具创新性的叙事策略。王曾深夜研读的《奏上时务书》,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道具,更成为展现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直接载体。作者没有将奏札内容大段抄录,而是通过王曾“亲自手录一份,置于案头,时时拿来翻阅”的动作,以及对“明黜陟、抑侥幸”等核心主张的提炼,让读者既感受到史料真实性,又避免了阅读障碍。这种处理方式暗合了清代纪昀对范仲淹“求学有济于天下”的评价,让思想的呈现更具历史现场感。

书中碑铭与史论的引用增强了叙事的权威性。小说开篇即引用韩琦、欧阳修、苏轼等人对范仲淹的评价,这些来自不同时代的声音构成了一种“历史回响”,让读者在进入故事前就对主人公的历史地位有了认知。在描写捍海堰工程时,作者暗合了《宋史·范仲淹传》中“泰州西溪盐仓监,建议筑捍海堰”的记载;在刻画庆历新政时,则呼应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改革措施的记录。这种“明引暗合”的史料运用,既保持了历史小说的严谨性,又避免了学术著作的枯燥感。

作者对史料的运用并非简单堆砌,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理解。当范仲淹因“冒死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时,小说插入其《陈时政疏》中的片段,让读者看到他“危言鲠论”背后的政治理念;当他在地方任职时,通过《答手诏条陈十事》的部分内容,展现其“在州县为能吏”的治理才能。这种将史料“打碎重组”的创作方法,让历史文献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成为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史料与文学的真正共生。

理想主义者的逆境修行

作者何辉没有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其“三起三落”的人生轨迹,展现这一精神形成的艰难历程,构建了一部理想主义者的逆境修行史。

青年时期的“丁忧掌学”是精神成长的重要节点。范仲淹因母去世“丁忧”,应邀执掌应天府书院。这看似平淡的经历,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深刻的精神内涵。作者通过他在书院“勤勤奉诲,以身先之”的教学实践,展现其“求学有济于天下”的教育理念;通过与青年学子的对话,流露其“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正是这段“退而讲学”的经历,为他后来“达则兼济天下”积累了精神力量,让“忧乐”精神有了学术根基。

书中范仲淹贬谪生涯中的坚守更显精神底色。第一次被贬是因“冒死谏言太后还政”,小说描写他离京时“行李萧然,唯有书籍数篋”,路人问其为何“自讨苦吃”,他答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展现了士大夫的风骨;第二次被贬因“反对废后”,他在途中写下“清议不可辱,君子有杀身以成仁”,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第三次被贬则因庆历新政失败,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成了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三次被贬,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但他的精神境界却一次比一次高远,让“忧乐”精神有了人生实践的支撑。

在陕西副押上任上,范仲淹面临的不仅是“宋夏血战”的军事压力,还有朝廷内部的掣肘。小说描写他“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威望,并非来自神化的描写,而是通过“筑城固守、招抚羌人”等具体策略展现其军事才能;他与韩琦“协力稳定边疆局势”的过程,充满了意见分歧与磨合,让“和与战”的决策更显真实。正是这种“在边境为名将”的实践,让“先忧后乐”的精神有了家国担当的厚度,不再是书斋中的空谈。

当夏竦、王拱辰等“陷害和排挤”新政派时,小说没有将失败归咎于个人恩怨,而是深入分析了“抑侥幸”等措施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深层矛盾。范仲淹“乞罢参知政事”时的坦然,以及在地方继续推行改革的坚持,展现了理想主义者的韧性。正如元好问所言,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这种“一身而备数器”的品格,正是“忧乐”精神在不同境遇下的呈现。小说结尾,当他在地方任上依然“兴修水利、兴办学校”时,“先忧后乐”的精神已然超越了政治成败,成为一种永恒的价值追求。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逆境里,范仲淹的“情绪稳定”堪称现代心理调适的典范。面对三次被贬的人生低谷,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地方继续其宦海生涯”,将挫折转化为实践机会。小说打破了对“清官”“贤臣”的简单想象,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范仲淹并非完美无缺的圣人,他在捍海堰灾难中也有“如果我早些下令撤退,就不会有那么多伤亡”的自责;他在朝堂斗争中也有对“与吕夷简的理念冲突”的无奈。这种“有血有肉”的描写,让读者理解历史人物的局限与伟大,培养辩证的历史思维。正如朱熹所言,范仲淹是“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但这“第一流”并非天生的完美,而是在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中实现的。

何辉的三卷本小说《范仲淹》以其严谨的史料考据、精湛的文学叙事、深刻的精神开掘,为历史小说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它让范仲淹这位“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历史人物从史书中走出,在文学的世界重新获得生命;它让北宋仁宗朝的朝堂风云、边疆烽火、市井生活变得可感可知,构建了一幅立体的历史图景;它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生实践。

也许当你合上书本,眼前依然会浮现那个在泰州海岸雨雪中纵马奔驰的身影——他既是天圣三年的兴化县令,也是千百年士大夫精神的象征;既是北宋庆历新政的改革者,也是留给当代的精神坐标。何辉用近百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活在当下的精神资源;文学不仅是美的创造,更是历史精神的传承载体。

不被限定的诗意

吴文漫

在大片沙漠中,这么一座很小的火车站,举目望去,四周全是漫无边际的黄沙。铁路横穿这片沙漠,只有东西两个方向,两种选择,无论哪一种,都通往远远的地方——梦寐以求的城市,或是美丽广阔的大海。而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如故事中所设置的那样,更多的时候是被困在原地,守在这个无事可做的火车站。即使是放假的星期天,我们也感到百无聊赖,因为远方那么遥远,值得看值得做的事情都在触不可及的地方,我们只能荒废掉一个又一个完整的星期天,用来打哈欠,用来等待下一个循环往复的星期一。于是,一天一天的时间,就在我们对远方的向往中被耗尽。而我们向往的往往都在通过一种方式去实现,攒下足够的钱,去度假,去远远地走一遭,去经历那些眼花缭乱的风景,再回到百无聊赖的原地细细回味。

能有这样的选择,当然也很不错。毕竟攒够了钱,远远地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这种生活中的仪式感,让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子有了希望,甚至有了诗意。但是,这种诗意是不是一种被规划好、被限制后的诗意呢?

铁轨只有两端,我们只能决定向东或者向西。可我们的生活,却并非只有东西两种选择——我们常常忘记,方向不止东西,还可以一路向北。北方没有既定的铁轨可以带我们到达,但是北方与我们的生活,或许有着更为诗意的关系。如果北方的路,是由我们自己的双脚走到的,那么那儿的风景又会是怎样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和我们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它简直就像是通过童话投射出的生活。

“到了傍晚,夕阳西下时,远处出现一个小黑点,越来越近,最后他们看清了,那正是布朗先生。他的眼睛闪着光,喜笑颜开。”布朗先生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不选择到海边,也不选择到美丽的城市,他想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一个用双脚就可以走到的地方。那是一片绿洲。离他们建在沙漠中的火车站居然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建造在小区旁的公园,或许四季都有不同的鸟儿来造访;与我们几条街距离的图书馆,或许有会为我们的人生之路带来转折契机的书籍;楼下的银杏树,或许已经很老且树龄惊人,正在簌簌落下美丽的叶子;清晨的菜市场,或许是我们写作素材丰富的发掘地;傍晚的天



《三个旅行者》,(英)琼·艾肯著,乐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联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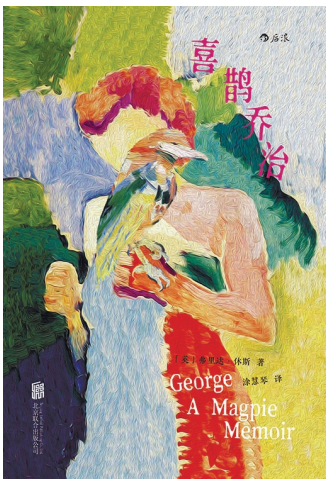
边,或许染着奇异层次的晚霞。你是否会稍稍驻足,与一个骑着脚踏车经过的孩子共同欣赏?我们总是要花费许多的时间、金钱、向往、耐心,去很远的地方寻找生活的希望。但生活的希望,对我们来说,究竟是美丽的城市、无边的大海,还是一片小小的绿洲就足够带来慰藉?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寻找到的生活中的诗意,究竟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双脚丈量,还是依靠着早已被修建好的庞然机器得来?

旅行回来的琼斯先生从远方带来摩天大楼的图纸和画着雄伟火车站的盒子,史密斯先生从另一端的远方带来珠光贝和白色水晶石。而布朗先生从不远处的绿洲带来的是一颗硕大多汁的橘子、一束蓬松的绿叶和蓝色的花。或许就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美好,是我们每一个匀速流逝的日子里,鲜活珍贵的美好。这样的美好,或许离我们更贴近,于我们更殷实,并且只在咫尺之遥。“站牌上,‘沙漠’底下,已经加上了‘通往绿洲’几个字。”

三个男人在沙漠站朝北的地方,在他们生活的发现里,诗意地躺下,认真地感受这不可替代的一天。这三个男人,不再是孤独的,因为他们心里的绿洲正在滋长,除了铁轨能帮助他们逃离生活的百无聊赖,他们的双脚也可以带他们踏入生活真正的中心地带——那片独属于自己的绿洲。

寻乐园

张小意



《喜鹊乔治》,(英)弗里达·休斯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9月出版。

本书开头的序曲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家》,弗里达·休斯以细腻的感知力描写小时候的匮乏、泥土、根基、立足之地、土生土长的现实和隐喻,以及一些出现在童年的宠物,而自己没能成为它们的归宿的遗憾。这本书将从一座小花园启程,寻找无数维度的彼此圆满。

我很不愿意细数在弗里达·休斯的生命之中,一个接一个的自杀事件或其不可测的影响力。而我自己年轻时,也是作者的母亲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位忠实读者。西尔维娅·普拉斯曾是美国重要的诗人,她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里那些优美的、战栗的、深渊般的、萤火虫式的精神描写令我陶醉。

我也不太想细说,自己经历的小姨疯癫,而后是表妹的自杀,因为各种各样的人生际遇、精神创伤都是有可能的。我见过无数近似或不近似的人或命运,表述可以这样或那样,然而其中包含了太多人,他们想表达而无法表达的孤独、沉痛和一点点脱身的拯救之路。

这儿,我想说说弗里达·休斯整日辛勤劳作的花园。英文世界中,约翰·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是文学史的巅峰。对生长于西方文化的人们,花园是一个很重要的意

象。它看起来庸常不过,只是中产阶级屋门前的必备,然而它是人类基因中最深刻的向往,它是亚当和夏娃最初天真的伊甸园,也是世间人们瞥见地狱、经过炼狱最后登顶的荣光。

你看,弗里达·休斯描写自己发现喜鹊乔治的过程。假山基座里一只受伤的幼鸟,嘴里满是苍蝇卵。作为读者,我一开始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就是乔治,直到弗里达·休斯一锹一锹地翻动坚硬的土地,见到另一只愤怒的小喜鹊,我才知道开头的那一只会死掉,不出意外,乔治这个光荣的名字,将落在愤怒的小鸟头上,成为生命的华冠——同时,她作为作者,轻柔地一抹我的主观。

沉浸在《失乐园》的文化之中,弗里达·休斯一心一意,感受一切得失错漏,寻找失去的乐园。这样一个一半阴影一半阳光的女儿,一点一滴,耐心地开拓荒原,搭建花园,进而养一只小喜鹊。这些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小事儿,脑海里的悲欢离合却如同撩人性命的海啸一再狂暴地发生。你的灵魂犹如一只穿越风暴的海燕,穿过去,奋力地穿过去,你身后的一切就会变成影子。

经历过,你就会沐浴阳光。生来局限的创伤,抑或后来经历的悲伤,实际上有太多的小说和诗歌在描述。在《喜鹊乔治》的日子里,弗里达·休斯先是不断地付出,然后与心爱的人分离,与心爱的喜鹊分离,也许一切心爱的,将会与我们一体,形成最结实的自我——当然,像每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她用心经过了一轮轮丧恸,从最深处涌来的冲击一波又一波,“我又失去了我爱的。”“我爱的终归会离开我。”“是我不够好吗?”“是我不配得到圆满和幸福吗?”

诸如此类必然发生的犹疑,是不可自拔的肉身黑暗,也是最终体悟阳光的思绪豁口。而瑞士当代著名德语作家彼得·施塔姆的短篇小说集《弃园》与之相对应,他曾写过一个结果截然相反的故事,故事是从邻居视角来写的。邻居看着一个经历了母亲的癫狂和重病的家庭,父亲和兄弟们相继自杀,唯一的女孩露丝喜爱阅读,着装整洁,甚至正常到结了婚,也有了幸福,看起来十分有希望像普通人一样庸碌而幸福,然而有一天,她的丈夫消失了,她不再出门了,她的花园渐败了。

在现实生活之中,渐败的结局更为常见,尽管每个人的潜意识都向往光明,都期盼一个光明的结局。每个人都愿意乐观地看待世界,某种意义上,人们收容悲伤的能力非常有限。他们有逃离痛苦和悲伤的本能。不过,其实平静和幸福这事儿,它既简单,又不那么简单。它需要刻苦,也需要天赋,它需要耐心,也需要机缘。